

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幾個爭議性問題 析辨

王 玉*

摘 要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中最為成功的一次策略運用，亦是改變中共歷史的策略運用，對中共的壯大以及後來的建立政權，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本文就幾個學者爭議性的問題化繁為簡作一分析辨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何時提出？是中國共產黨獨自提出？抑是其領導機關「共產國際」授意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蔣」的態度如何？由原先的「反蔣」到後來的「聯蔣」、「擁蔣」，中共與共產國際的考量是否一致？是什麼因素使原先的策略作了轉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內容與本質又是什麼？釐清上述問題，將有助於我們瞭解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歷史中的立場、角色與地位。

關鍵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國際、八一宣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共同學科專任講師、逢甲大學歷史與人文教學組兼任講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壹、前言

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運動源自於蘇聯，同樣也是打著馬克斯的旗幟。但是馬克斯的學說理論，其實乃是針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弊端，提出其科學的社會主義。而列寧則從自己俄國革命的經驗，發覺到俄國境內的弱小民族，以及東方殖民及半殖民地的廣大被壓迫民族的問題，於是遂在西方反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路線之外，另建東方殖民半殖民地的反帝民族革命路線，並將此革命視為是達到社會革命的一環——因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¹，其必然向殖民地掠奪原料、勞工，和市場，所以反帝斷絕了資本主義的後繼力量，動搖了資本主義的基礎，使西方的社會革命更易於達成²。如此，將東方的民族解放鬥爭，和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結合為一個整體，作為推動「世界革命」的基本動力³。而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運動，正是列寧這樣一個意識型態下的產物。

但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力量微不足道，所以共產國際為其設計了一套策略——加入國民黨⁴，這是中國共產黨採行「統一戰線」的開始。

那麼，什麼是統一戰線呢？它的理論基礎源自於馬克斯與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⁵，後來列寧在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斯主義的統一戰線思想，將它從哲學的層面擴展到政治學的領域，並且轉化成一種鬥爭的策略和鬥爭的手段⁶。而依照俄共的說法，統一戰線就是在沒有手槍可用，又必須消滅敵人的情形下，就要製造一個擁抱敵人的機會，在擁抱中用雙手扼死敵人⁷。換句話說，統一戰線是一個弱者求勝的戰略，其主動與敵人結盟，但聯合中間不忘鬥爭，最終的目的則在消滅敵人⁸。

從此，統一戰線成為中國共產黨革命當中的重要武器。它隨著時空的變動

¹1916年列寧寫〈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詳述這項論點。可參見《列寧選集》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頁730-845。

²列寧的觀點在布爾什維克內發生重大的影響，如布哈林、史達林、托洛茨基均曾對此大加闡述；史達林「勿忘東方」和托洛茨基「由北京經加爾各答是通往世界革命的捷徑」的名言均由此而來。

³有關「民族和殖民地問題」，首次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1920年7月19日舉行）中被討論。

⁴在過去一般都以為共產國際是中國「革命」的指揮總部，今根據郭恆鈺，《俄共中國革命密檔（一九二〇～一九二五）》（台北：東大圖書發行，三民總經銷，民國85年1月初版）證實其實俄共中央政治局才是世界革命的指揮總部，共產國際不過是一個執行決議、傳達指示的對外機構而已。見該書〈前記：關於俄共的中國革命密檔〉，頁3。

⁵王邦佐主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緒論頁1。以及林華田，《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透視》（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4年9月初版），頁2-3。不過郭恆鈺教授似乎並不認同這個看法，他謂：「統一戰線是個新名詞，是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成立以後才有的。」見其專著《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78年1月初版），代序頁5。

⁶見王邦佐主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緒論頁2。

⁷此是共產國際主席西諾耶夫的說法，經郭恆鈺教授解說原意。參見《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代序頁5。

⁸因為統一戰線有特殊的涵義，故不適用一般的合作、團結、聯合、合縱等等原型的解釋去看待。而此也是郭恆鈺教授要將「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名為「國共統一戰線的」緣由。

和條件的轉換，而有不同的口號、性質、內容，以及任務，但是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最終目標，則始終不變⁹。毛澤東甚至曾經明確的指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戰勝敵人的三個主要的法寶¹⁰。其中，統一戰線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¹¹。

本文是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史中，選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階段為範疇，將許多學者爭議的觀點，化繁為簡，歸納出幾個問題，提出個人析辨後的看法。因為眾所周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的統戰史中，最為成功的一次策略運用，亦是一個改變中共歷史的策略運用¹²，對於中共的發展和建立政權，有其重大的意義¹³。在過去因為有許多資料沒有公開，所以研究成果多侷限在表象，直接的論證十分缺乏。加上這段歷史極為錯綜複雜，它既是共產國際反法西斯主義的一環，但也有中國共產黨自己獨自的經驗。而統戰既然是一種鬥爭的手段，所以外表的宣傳與其內裡不見得一致。加上長期以來，國民黨和共產黨為了爭奪「抗日領導權」的歷史地位，雙方各執一詞，互相攻擊指責，更讓歷史的真相撲朔迷離。所以本文的探討，也企圖為錯綜紛紜的史實找出持平客觀的答案。

貳、提出的時間

對於這個問題一共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就提出來了。另一種較普遍的觀點則認為，是在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才被提出的。

一、九一八事變後提出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就發表宣言，提出組織群眾的反帝運動，發動群眾鬥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接著還發出號召，為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各界都要行動起來，工人罷工，農民騷動，學生罷課，貧民罷業，兵士譁變。這實際上是提出了發動廣大群眾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方針，說明我黨逐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¹⁴

⁹參見楊清海，《中共統一戰線剖析——組織、演變、論證》（台北：龍文出版公司，1991年9月），頁11。

¹⁰見《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10.4），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頁602。

¹¹趙春山評陳存恭，〈毛澤東抗日統戰策略初探〉，《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國史館出版，民國85年3月），頁725。

¹²林華田，《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透視》，序頁1。

¹³同註11。

¹⁴任伍，〈胡雲秋研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提出新看法〉，原文見《湖北日報》（1985年7月25日），今轉引自方曉主編：《中共黨史辨疑錄》（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頁569。

二、〈八一宣言〉時提出

「〈八一宣言〉標誌著黨的策略轉變，它貫穿擴大聯合、集中打擊主要敵人的策略思想，是從打倒國民黨統治，建立蘇維埃，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的開端。」¹⁵「眾所周知的是：在我黨的歷史文獻中，只有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成稿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按即〈八一宣言〉）才首次明確的提出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主張。」¹⁶「〈八一宣言〉初步糾正了關門主義，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內容，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策略開始了一個新的轉變。」¹⁷

三、論證

（一）文獻分析

那麼，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正式提出來的呢？個人以為，首先應該從掌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涵義」出發。目前學術界對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幾點公認的特徵：第一、是以抗日救亡的「民族主義」作號召的旗幟。第二、是以國內所有的黨派、團體、階級、軍隊、群眾作為聯合的對象——亦即採行所謂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第三、標榜不談階級鬥爭與赤化運動。

接著，我們把九一八事變後與〈八一宣言〉提出後，中共的重要統戰文獻作一個比較分析，並以圖表的方式作一個對照¹⁸：

¹⁵ 如孟慶海，〈第二次國共合作與黨的策略轉變〉，《松遼學刊》1984年第1期，頁49。

¹⁶ 夏以溶，〈共產國際與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的關係初探〉，《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3期，頁8。

¹⁷ 李坤，〈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的歷史過程〉，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第二次國共合作》（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頁74。

¹⁸ 分析所根據的文獻如下：

〈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1931.9.20）

〈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州事變的決議〉（1931.9.22）

〈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三省第二次宣言〉（1931.9.30）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佈對日戰爭宣言〉（1932.4.15）

〈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臨時中央委員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1933.1.17）

〈中共中央為日本帝國主義佔領華北併吞中國告全國民眾書〉（1934.4.10）

〈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提出〉（1934.4.20）

〈中央致各省委、縣委、市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關於開展反日反帝運動和組織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問題〉（1934.4.20）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為國民黨出賣華北宣言〉（1934.6.19）

〈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1935.8.1）

〈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1935.10）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日本帝國主義併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1935.11.28）

〈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通過）（1935.12.25）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12.27）

	九一八事變後	〈八一宣言〉提出後
對日本侵華的認知	是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爭的序幕	是日本要併吞全中國
對國際局勢的分析	是帝國主義「反革命」營壘對抗「革命」營壘	帝國主義之間尚有不同的陣營
對國民黨的評論	投降帝國主義 出賣民族利益 中國的賣國賊 日本的看門狗	投降帝國主義 出賣民族利益 中國的賣國賊 日本的看門狗
對國內階級的看法	是「革命」階級與「反革命」階級兩大戰線的對立	「革命」戰線擴大，「反革命」戰線縮小
呼籲要打倒的敵人	1. 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 2. 國民黨及一切非無產階級的黨派、團體、軍隊、階級、群眾	起初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後來矛頭只有日本帝國主義
統戰的口號	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武裝保衛蘇聯	抗日救國
統戰的形式	下層統一戰線為主	上、下兼俱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統戰的對象	工、農、兵士、學生，和貧苦群眾	所有抗日愛國的個人、派別、政黨、階級、團體、軍隊、民族、國家等
統戰的策略	1. 加緊工人鬥爭，爭取在一省或數省中心城市的勝利 2. 進行農民的土地革命鬥爭 3. 組織與武裝廣大的勞苦群眾	要使所有的人民都參加到反日的戰線上
統戰的領導機關	全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	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
統戰的行動方針	六大綱領	十大綱領

根據上面的圖表顯示，中國共產黨在兩個時期當中，對於日本侵華的目的、國際局勢的態勢、以及對中國政局和階級的變化等等，觀察後的認知有很大的不同，所以相對採行的統戰策略也有變化：在九一八事變的時候，中共認為日本佔領東三省，是打算以東三省為根據地，以進一步的進攻蘇聯。這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對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進攻的先聲。所有的帝國主義都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凶，國民黨等資產階級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看門狗。因此，中國共產黨呼籲，所有的工、農、兵士、勞苦民眾要大團結，來保衛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要打倒一

〈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会電〉(1937.2.10)

〈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意義及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会電宣傳解釋大綱〉(1937.2.15)

〈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1937.7.15)

切的帝國主義，及各派國民黨和一切軍閥，以爭取中國工農兵蘇維埃鬥爭的勝利。

這顯然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特徵不符；而〈八一宣言〉之後的主張則是吻合的。

（二）史事驗證

而我們再進一步檢視從九一八到〈八一宣言〉期間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戰役的時候，被中共攻擊為「不抵抗」的國民政府，派遣十九路軍及第五軍與日本抗擊¹⁹。此時高呼「抗日」的中國共產黨，則公然號召十九路軍的士兵「倒轉槍來向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瞄準」，「殺掉你們的長官加入紅軍」²⁰，反而是扯了國軍抗日的後腿。又對當時在東北奮勇抗戰的馬占山等人，共黨指稱這些是國民黨利用抗日招牌來欺騙大眾製造出來的「民族英雄」美名，目的是「來侵吞民眾的捐款，來向帝國主義投降出賣」²¹。所以對馬占山等這些「帝國主義最狡猾的奸細」，「同時也必須反對他們」²²。此外，對一九三三年組織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的馮玉祥，和組織福建人民政府的陳銘樞、蔡廷鍇等人，中共此時都把他們當作是危險的敵人。雖然早有聯繫，但拒絕和他們作進一步或具體的統一行動²³。

凡此種種，均證明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共統一戰線的「階級意識」明顯超過〈八一宣言〉後標榜的「民族意識」。

因此，以九一八事變作為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的起點，是與真相不符的；應該以〈八一宣言〉作為起點才是確實的²⁴。而事實上，自中共發表〈八一宣言〉以後，其輿論上的聲勢日漸起死回生，以致後來中共不得不承認，從九一八到〈八一宣言〉期間，領導中共的國際派犯了有路線「偏差」的錯誤²⁵。

¹⁹ 見〈蔣委員中正致十九路軍蔣光鼐總指揮、蔡廷鍇軍長等指示作戰計畫電〉（民國 21 年 2 月 5 日）、〈蔣委員中正致張治中軍長、俞濟時師長勸勉第五軍將士以十九路軍名義抗戰應生死與共團結奮鬥無分彼此榮辱電〉（民國 21 年 2 月 18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緒編（一）》（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 70 年 9 月初版），頁 447、458。

²⁰ 〈中央關於上海事件的鬥爭綱領〉（1932.2.2），中華全國總工會編，《中共中央關於工人運動選編》（中）（北京：檔案出版社出版，1985 年 9 月第一版），頁 164。

²¹ 〈請看：反日戰爭如何能夠得到勝利？〉（1932.2.26），中華民國開國文獻編纂委員會及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 附錄 共匪禍國史料彙編》第二冊（台北：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民國 53 年 10 月），頁 151。

²² 〈中央給滿州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1933.1.26），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 2 月），頁 320。

²³ 中共對馮的看法是「借著抗日的招牌，欺騙士兵民眾，掩蓋他勾引日本帝國主義進攻察哈爾、綏遠，以便帝國主義準備反蘇戰爭的陰謀。」再對於福建人民政府的領導人蔡廷鍇等人，中共攻擊他們是「反革命的領袖」。參見楊奎松，〈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形成與共產國際〉，《近代史研究》1982 年第 4 期。

²⁴ 儘管一九三四年前後，中共已搖擺在由下往上的統一戰線矛盾中，但根本上「左傾」仍是最明顯與主要的特徵。何況在沒有共產國際的批准之前，中共任何的決議都無法最後定案（詳情見下一章）。

²⁵ 1941 年以後幾乎所有的中共史書都將責任歸咎為，由於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在共黨中央佔據統治的地位，在如何開展反帝鬥爭上，存在著嚴重的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以致削弱了共產黨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的組織和領導作用。

參、策略制定與共產國際的關係

〈八一宣言〉雖然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提出的起點，但它並不是中共在中國提出的，而是由中共駐共產國際的首席代表王明（陳紹禹），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代表大會的新方針所起草²⁶，並經過史達林及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批准，於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代為發出的²⁷。因此，〈八一宣言〉毫無疑問的是共產國際策略路線的複製品。

但是共產國際“七大”期間，中共正「長征」流竄於四川毛兒蓋地區，雙方的電訊早已斷絕多時²⁸，因此共產國際為了傳達新的政策指示，在“七大”結束後，指派張浩（林育英）回國和中共中央聯繫。所以，當後來中共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在陝西安定縣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並於二十五日通過〈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一般稱為〈瓦窯堡會議的決議〉），正式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確立為全黨的新策略路線時，研究中共黨史的人就產生了分歧的看法：

一、共產國際指示推動下制定的

「共產國際在“七大”期間，批准了我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全國建立包括一切黨派的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共產國際“七大”以後，共產國際派出中共代表團成員林育英回國，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推動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
 「總之，〈決議〉……比較系統地提出了即將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應該說，這是我黨積極貫徹共產國際“七大”決議的成果。」²⁹「這個工作（指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的黨中央所不能完成的。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五年的長征中也是不可能完成的。直到這時，在共產國際關於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正確政策的幫助之下，黨在八月一日發表了號召統一戰線的宣言，特別是黨中央政治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通過了〈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毛澤東同志在十二月二十七日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才滿足了這個要求。」³⁰「共產國際為順應形勢的發展，乃為中共開出了統一戰線的藥方，這樣才把中共從死亡邊沿拯救出來。」³¹

²⁶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是在一九三五年的七月二十五日到八月二十日於莫斯科舉行。

²⁷ 有關王明如何完成〈八一宣言〉的經過情形，可參閱黃修榮，《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史》（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頁203-204。

²⁸ 自一九三四年六月起，因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嚴重的破壞，以致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聯繫渠道中斷。見黃修榮《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史》（下），頁185。

²⁹ 王綺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與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江西大學學報》1985年第3期，頁10-11。

³⁰ 胡喬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轉引自前文，頁11。

³¹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三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東亞研究所印行，民國67年6月第3版），頁125。

二、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制定的

但另外也有人持不同的觀點，認為在張浩回國之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路線的基本思想就已經大致完成了，所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完全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制定的，這與共產國際“七大”所制定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策略只是一種巧合。³²

主張這種看法的人根據有二：一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黨「左的錯誤被克服了」，「我們黨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時代開始了」，而共產國際「恰巧在同一年晚些時候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也放棄了原先的關門主義策略。」³³「這個策略（按：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所以得以確立，從根本上說，是遵義會議後黨對策略轉變所進行的一系列探索發展的必然結果，……。」³⁴

根據第二是：「在到達陝北後，黨中央立即著手研究了黨的策略路線問題，一九三五年十月便作出了〈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瓦窯堡會議決議的基本思想此時已提出來了，黨的策略由王明“左”傾關門主義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轉變，此時已經基本完成。」³⁵

三、論證

（一）檢視中共獨立自主的證據

1. 遵義會議其實並未克服“左”傾的錯誤

首先，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中，已經克服了所謂的“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這可能與事實不符。因為遵義會議當年的決議〈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是這麼說的：「一年半反對圍剿的困苦鬥爭，證明了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一切企圖拿黨的正確路線來為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路線作辯護是勞而無功的」；「過去黨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對於我黨的整個路線說來不過是部份的錯誤」³⁶。

換言之，在遵義會議上，中共承認在反國民黨五次圍剿中，軍事路線犯了錯誤，但是有關政治路線，則還不承認有錯³⁷。因此會議的主要重點是集中在軍事與組織問題的解決。那麼，所謂克服了“左”的政治關門主義的說法，自然也不存在。

³² 夏以溶，〈共產國際與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方針的關係初探〉，《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3期，頁6。另外，金再及，〈關於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幾個問題〉也持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看法，《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頁124。

³³ 參見前註中所引二文。

³⁴ 金再及，〈關於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幾個問題〉，頁129。

³⁵ 同前註，頁126、128。

³⁶ 〈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1935.1.8 遵義會議），《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頁679、691-692、695。

³⁷ 事實上，中共當年總的政治路線也犯了錯誤，在遵義會議上已有人提出質疑，只是沒有被「糾正」。

2. 毛兒蓋的決議與“七大”不同

其次，還有一份文獻可以證明所謂的「巧合」也是不存在的。那就是正當共產國際“七大”在莫斯科舉行期間，中共也在毛兒蓋舉行了中央政治局會議，並且在八月五日通過〈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文件中說：「中國革命形勢的依然存在，證明蘇維埃革命並未低落，而是繼續發展著」；開展「反帝國主義與反國民黨的鬥爭」；「必須深入農民土地鬥爭，徹底解決土地問題」³⁸。這些證明當時中共第三次“左”的路線依然存在³⁹。

3. 〈秘密指示信〉與〈抗日救國宣言〉有差異

雖然上述二點似乎駁斥了中共的「獨立自主性」，但是，十月份的〈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確實是一份值得注意的文件。這封信只註明「一九三五年十月」，卻沒有明確的日期。但根據文中「可是英勇的紅軍，……，現終究在艱苦的鬥爭中，很勝利的到達他們預定計畫對日宣戰的目的地——陝甘青寧晉……」⁴⁰顯示信應該是在中共長征到達陝北之後發出的。又根據《毛澤東年譜》以及《周恩來年譜》的記載，中共是在一九三五年的十月十九日抵達陝北保安縣的吳起鎮⁴¹，所以〈秘密指示信〉的日期應該是在十月二十日到三十一日中間。

而這是一封非常詳盡的指示信。其一開始就尖銳的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抗日討蔣是目前中國唯一的出路，是中國共產黨目前工作中最主要的任務。」之後，信中全面地分析了「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蔣介石妥協投降政策」，所引起的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動。指出「目前中國革命的社會基礎大大的擴展了」，雖然這些人「因階級利益之不一致，其參加革命鬥爭的熱情與程度也各有差異」，但是，「革命者都不能拒絕與之聯合戰線」。因為「現在如果不見到中國這樣的新的階級變動，不認識新的革命力量，不會使用這些新的力量，那麼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國共產黨的總的策略方針是「進行廣泛的統一戰線」——只要抗日反蔣，則不論什麼階層、階級、黨派都是聯合的統戰的對象。此外對於統一戰線的形式、實現的條件、組織的原則、領導的方法，以及對黨內兩條戰線的鬥爭問題，都一一具體的說明⁴²。

重要的是，指示信與〈八一宣言〉，在內容上並不完全相同：比如〈八一宣言〉雖然極為尖刻的攻擊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中正是「賣國政府」、「人面獸心的敗類」、「漢奸賣國賊」、「賣國殃民」、「罪惡滔天」、「日寇蔣賊內外夾攻」，但

³⁸ 〈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1935.8.5 毛兒蓋會議），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頁35、36。

³⁹ 在中共黨史當中，瞿秋白路線（中共八七會議—六大）日後被評為第一次左的路線；李立三路線（六大—六屆三中全會）被評為第二次左的路線；王明路線（六屆四中全會一）則被評為是第三次左的路線。

⁴⁰ 〈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北京：檔案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頁20。

⁴¹ 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頁481-482。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一八九八～一九四九）》，（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頁294。

⁴² 詳細內容見《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頁19-28。

統戰的字眼中卻沒有出現強烈的反蔣或討蔣的字眼；甚且對於國民黨、國民黨的情治人員、國民黨的軍隊，都在統戰聯合之內⁴³。可是指示信中對於蔣、以及蔣所領導的國民黨，和國民黨的政府，則呼籲一律在打倒之列。又其次，〈八一宣言〉主張設立「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機關，並提出十大政綱作為行動指南。但是這些在指示信中也隻字未見。

可是在相隔一個月之後，也就是中共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所發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則不論在遣詞度句上，或是在內容上，與〈八一宣言〉幾乎是如出一轍⁴⁴。

因此，中國共產黨是否真的在得悉共產國際的指示之前，就已經獨立自主的基本解決了“左”的路線？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知道被共產國際派遣返國的張浩，究竟是在什麼時候返抵陝北的？

4. 張浩抵達陝北的日期

關於張浩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的日期，其實眾說紛紜。有說十一月的⁴⁵、十一月中旬的⁴⁶、十一月下旬的⁴⁷、十二月的⁴⁸，比較明確的是說在十一月七日⁴⁹，或十一月十八日左右⁵⁰，或推論在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一月二十八日之間⁵¹。但是沒有一個說法是在十月份的。

如此說來，〈秘密指示信〉與共產國際的“七大”決議和〈八一宣言〉是沒有關係的。

5. 〈秘密指示信〉其來有自

另外，如果說中共初抵陝北，正忙於新據點的安頓，是否有可能在短短十天之中，提出新的統戰策略？有否可能是將指示信的日期錯置？

但是如果我們從〈八一宣言〉往前溯源，可以發現其實在〈八一宣言〉之前，中共的統戰文件中，已隱隱然有與中間或上層階級合作的態度傾向：比較明顯的實証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假「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

⁴³ 楊奎松，〈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與共產國際〉文中謂：「這個宣言，由於公開宣佈願以民族精神與一切派別，甚至包括處於戰爭狀態的國民黨軍隊組成統一戰線，共同抗日，因而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頁78。

⁴⁴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發表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這是第一次在陝北發佈和八一宣言內容一致的文件」。參見李坤，〈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的歷史過程〉，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第二次國共合作》，頁74。

⁴⁵ 如黃修榮《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史》（下），頁209。

⁴⁶ 如《毛澤東年譜（一九三三—一九四九）》上卷，頁489。

⁴⁷ 如王邦佐主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頁181。

⁴⁸ 如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三冊，頁108。

⁴⁹ 此根據李維漢的回憶，參見金再及，〈關於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幾個問題〉，頁128註釋1。

⁵⁰ 見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近代中國》1955年第1期，頁262。

⁵¹ 向青、石志夫、劉德喜主編，《蘇聯與中國革命（1917—1949）》（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頁397。

的名義，提出了〈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其中鼓勵「中華民族武裝自衛」以「自救和救國」，並提出六項共同的行動綱領：「全體海陸空軍總動員對日作戰」、「全體人民總動員」、「全體人民總武裝」、「立刻設法解決抗日經費」、「成立工農兵學商代表選舉出來的全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聯合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敵人」等等⁵²。

而在同日〈中央致各省委、縣委、市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中，則不但指示各地積極貫徹前述的綱領，要「盡最大可能團結一切反日的力量來建立真正廣大的民眾的反日統一戰線」，並且還指示活動盡可能利用「公開或半公開的形式」，要將中國共產黨的言論或活動退居在第二線，也就是不要以發起人、倡導者自居，卻是以贊成和擁護者的面貌出現⁵³。

諸如此類，都已經超出下層統一戰線的範圍了，且與一九三五年十月份的指示信內容相近。可見中共就算是在初抵陝北時就提出新作法，也並不能算是突兀。

何況再根據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的〈中共臨時中央局關於最近華北事變與黨的緊急任務〉文件中發現，雖然當時中共還未能將日本與其他帝國主義區分出來，但已發覺「這兩個統一戰線（按即上層的和下層的）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這也意味著要走向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了。並且文件的最後還交代「將有更詳細的機密的指示信」⁵⁴，說明了中共的轉變，確實是有蛛絲馬跡可循，指示信應該沒有時間錯置的情形。

（二）檢視共產國際推動指導的證據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共產國際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制定上，仍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原因是早在一九三三年初希特勒上台以後，共產國際隨著國際情勢的劇變，已逐漸改變原先“左”的策略，它在西方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口號，打算要和原先攻擊的社會民主黨和中間階層合作。而在東方則提出了建立反帝統一戰線的方針⁵⁵。可以說，共產國際“七大”的策略轉變，是有一個過程的；而這點中共在「長征」以前也是瞭解的：

1. 六條綱領是國際的指示

關於前述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以「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的名義提出的六條綱領，其實是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共產國際影響下，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寫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六條行動綱領⁵⁶。

⁵² 〈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上）（北京：檔案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頁250-256。

⁵³ 〈中央致各省委、縣委、市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同前書，頁257-267。

⁵⁴ 〈中共臨時中央局關於最近華北事變與黨的緊急任務〉，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北京：檔案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頁1-11。

⁵⁵ 參見黃修榮，《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史》（下），183。

⁵⁶ 同前註。

2. 瓦窯堡的決議有雙方內容的結合

若把〈八一宣言〉與〈中央爲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和〈瓦窯堡會議的決議〉三份文件對照來看，可以發現〈瓦窯堡會議的決議〉其實是融合了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兩方面的意見。

換言之，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制定，有共產國際策略轉變的背景，也有中國共產黨自身在實際經驗中，摸索體驗出來的辦法。兩方都有更廣泛統一戰線需求的體悟，但也有因經驗不同而產生的差異。總之，是要等到張浩帶來了莫斯科的新訓令，中共才一方面先行發出應和的〈抗日救國宣言〉⁵⁷，另一方面則等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從直羅鎮的前線回來⁵⁸，然後在十二月十七日瓦窯堡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當中，正式號令全黨實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

肆、對「蔣」方針的轉變及與共產國際的關係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一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其統戰的對象既包含工、農、兵士、勞苦民眾等下層階級；又包含原先要打倒的地主、富農、商人、企業家、各政黨、派系等上層份子。而中國國民黨身爲當時中國的執政黨，同時也是第一大政黨，在廣大群眾中有很深的基礎和影響力，所以如何對待蔣中正，以及「蔣」所領導的黨與政府，就成爲中共統一戰線必須要解決的問題。而在這個相關的主題上，一直存在著許多不同的議題和論點：

一、對「蔣」方針的階段數

關於中國共產黨對「蔣」的策略方針，究竟經歷過幾次轉變？就有三階段與兩階段不同的看法：

（一）三階段

認爲中共在對「蔣」與國民黨的態度上，經歷了抗日反蔣、逼蔣抗日，和聯蔣抗日三個階段。其中逼蔣抗日是反蔣抗日轉變到聯蔣抗日的橋樑，它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起著關鍵性的作用⁵⁹。「黨根據變化著的政治形勢，經過了抗日反蔣、逼蔣抗日和聯蔣抗日這樣三個不同階段，在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終於迎來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⁶⁰

⁵⁷ 當張浩帶來指示時，中共中央總書記是張聞天。十一月二十八日發表的〈抗日救國宣言〉是其以中共中央名義先行發佈的。另一方面則於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寫信給在前線的毛澤東等告知此事。

⁵⁸ 周恩來在12月8日回到瓦窯堡，毛澤東則在13日。

⁵⁹ 石偉夫、胡華丁：〈論黨的逼蔣抗日方針〉，《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轉引自方曉主編，《中共黨史辯疑錄》，頁529。

⁶⁰ 李維志，〈共產國際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週年〉，《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5年3期，頁13。

（二）兩階段

認為「逼蔣抗日其目的是爲了聯蔣抗日，因此，逼蔣抗日的開始，也可以說是聯蔣抗日的開始。」⁶¹「所謂逼蔣抗日，其基本的出發點和基本的目的均在於聯蔣抗日，逼蔣只是爲了達到聯蔣的一種策略手段。」⁶²因此中共對蔣的方針經歷的是兩個階段，不是三個階段。

二、對「蔣」方針如何劃分階段

其次，對於抗日反蔣、逼蔣抗日，和聯蔣抗日的階段究竟該如何劃分，也有四種不同的論點：

（一）第一種看法

認為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爲反蔣抗日階段。從一九三六年五月到一九三七年二月期間，爲逼蔣抗日階段。從一九三七年二月到九月二十三日，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階段⁶³。

（二）第二種看法

認為「抗日反蔣的活動，應從一九三五年底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與張學良、楊虎城的結合，形成西北大聯合，而以配合兩廣事件到達一個轉捩點。逼蔣抗日的活動，應自一九三六年八月共產國際的指示必須以蔣爲聯合的對象，中共仍不放棄反蔣派軍閥的聯合，而以發生西安事變到達一個轉捩點。聯蔣抗日的活動，應自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五屆三中會接受中共的要求和保證而通過的「根絕赤禍案」，至同年七月抗戰發生，南京方面放鬆了談判條件，中共取得獨立自主的機會，達成了聯蔣抗日方針。」⁶⁴

（三）第三種看法

認為「自瓦窯堡會議後至一九三六年夏，中國共產黨的策略口號，基本的是抗日反蔣。」⁶⁵「（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又向全黨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這標誌中國共產黨完成了由抗日反蔣向逼蔣抗日策略方針的轉變，……。」⁶⁵「總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誌國民黨的政策有了進一步的轉變，標誌著國共合作的初步形成。」⁶⁵

⁶¹ 郝晏華：《從秘密談判到共赴國難——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形成探微》（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10月，北京第1版），頁102。

⁶² 楊奎松：〈三十年代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革命關係若干事實考辨〉，《黨史研究》，1987年第2期，轉引自方曉主編《中共黨史辨疑錄》，頁530-531。

⁶³ 見洪萬辰、胡華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及其特點〉，《寧波師院學報》1984年第4期，前引書，頁577。

⁶⁴ 蔣永敬，〈論中共抗日統戰初期的「抗日反蔣」方針〉，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台北：近代史學會出版，聯經總經銷，民國85年初版），頁876。

⁶⁵ 張梅玲，《干戈化玉帛——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3

(四) 第四種看法

認為抗日反蔣階段起自九一八事變，迄止於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周恩來、張學良舉行的延安會商。逼蔣抗日階段，即在周、張延安會商結束，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中共向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四項保證。聯蔣抗日階段，從五屆三中全會，經過七七事變，八一三抗戰，蔣被迫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⁶⁶。

三、方針的轉變與共產國際的關係

(一) 認為中共中央對「蔣」策略的轉變與共產國際一致：

「從時間上判斷，共產國際，特別是中共代表團根本放棄抗日反蔣方針的時間為七月（一九三六年）下旬。而中共中央放棄反蔣抗日方針的時間為八月下旬。因此就時間而言，這兩者的方針轉變應該是前後銜接的。」⁶⁷

(二) 認為中共中央策略方針的轉變不僅同共產國際毫無關係，而且簡直同共產國際的方針相左：

「在方針轉變問題上，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有重要的區別，即前者是從抗日反蔣一下子跳到聯蔣抗日的道路上去了，而後者則經過了一個重要的中間階段，即逼蔣抗日階段。」⁶⁸

四、論證

對於上述三個議題的眾多見解，個人的看法綜合整理如下：

(一) 共產國際與中共對「蔣」的策略，步調並不一致

在共產國際召開“七大”期間，中共駐國際代表及第三國際尚不知道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及「長征」初期受挫等情形。是會議閉幕的那天，方由從中國前往參加“七大”的陳雲、陳潭秋、楊之華等人抵達莫斯科，告知了上述的消息⁶⁹。由於這樣一個變化，加上蘇聯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有改善的趨向，共產國際與中共代表團，開始放棄以中國共產黨為主體來建立統一戰線的思想，轉而抬高國民黨⁷⁰。於是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八一宣言〉於巴黎《救國報》第

月第1版)，頁192、211、353。

⁶⁶ 見夏以溶：〈再評反蔣抗日方針兼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分段〉，《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2期，頁66、74-76。

⁶⁷ 楊奎松：〈三十年代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革命關係若干史實考辨〉，《黨史研究》，1989年第2期，轉印自方曉主編，《中共黨史辯疑錄》，頁527。

⁶⁸ 見前書，頁527-528。

⁶⁹ 向青、石志夫、劉德喜主編，《蘇聯與中國革命（1917-1949）》，頁396。

⁷⁰ 同前註。

十期正式發表的時候⁷¹，報上「反」蔣的色彩已被極力沖淡了。

此後國內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運動，一九三六年的「東征」，以及建立西北統一戰線當中，都還堅持「反蔣抗日」路線。但同期間的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已轉向「聯蔣抗日」了⁷²。如一二九學潮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救國時報》第一期發表了題為〈中華民族一致對外〉的社論；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和九日，《救國時報》連載〈第二次國共合作有可能嗎？〉，都正式提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問題⁷³。雖然中間曾一度因為共黨一二九學潮的影響，短暫的由「聯」倒回到「反」，但一九三六年五月，當陳立夫與鮑格莫洛夫接洽之後，共產國際的態度又由「反」恢復為「聯」，並強烈要求中共也實行聯蔣策略⁷⁴。

所以，共產國際的對「蔣」策略，確實只有兩個階段。而中國共產黨則因為主觀條件、客觀原因、國內政治演變、共產國際影響，以及「蔣」的態度等種種現實因素的考量，逼蔣的階段是顯然存在，難以避免的。

（二）「反蔣」由來已久，但立足點有別

如前所述，抗日反蔣不能算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提出的新口號，因為在〈八一宣言〉之前所謂王明領導的「第三次左傾」階段，相同或類似的字眼就已經出現多次了⁷⁵。但是，必須釐清的是，同樣的口號，在兩個階段有著不同的意義：在第三次左傾時期，中共將抗日的反帝戰爭與反蔣的國內戰爭，等量齊觀，一體進行。兩者都是置於無產階級對抗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立場。但是到了實施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以後，發現民族戰爭與階級戰爭無法同時並行，所以反蔣鬥爭必須由前一階段的與抗日並列，轉為置於反日的民族鬥爭口號之下。這一點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彭德懷、毛澤東的一份〈關於目前不應發佈討蔣令等問題致張聞天電〉中，將箇中緣由披露得十分清楚：「在此時機發討蔣令，策略上把我們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幟弄模糊了。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在討日令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在這口號之外，同時發布主張內戰的討蔣令，在今天是不適當的。」⁷⁶

換言之，「內戰」、「討蔣」的根本目標其實未變，但以蔣不抗日作為攻擊、反抗、打倒蔣的口實，「最能爭取落後人民與蔣系部隊，最能取消蔣介石之政治資本」⁷⁷。而此亦為後來的逼蔣，聯蔣策略方針作了伏筆。

⁷¹ 《救國報》是中共代表團在法國巴黎創辦的一種中文報紙。該報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創刊，至同年十二月初，因法國政府干涉而停刊，一共發行了十六期。但同年十二月九日，該報又以《救國時報》為名復刊。

⁷² 向青、石志夫、劉德喜主編，《蘇聯與中國革命（1917—1949）》，頁404。

⁷³ 同前書，頁404--405。

⁷⁴ 同前註。

⁷⁵ 有人用反蔣抗日一詞，以和逼蔣抗日、聯蔣抗日一致。在中共的文獻中，抗日討蔣、反日反蔣、反日討蔣，也常互用。

⁷⁶ 〈關於目前不應發佈討蔣令等問題致張聞天電〉（1936.4.9），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11月），頁93。

⁷⁷ 同前註。

（三）對「蔣」方針的階段劃分雖有脈絡可理，但亦有重疊與矛盾現象

中共由反蔣到逼蔣再到聯蔣策略的時間劃分，歸納上述各家的說法：以抗日反蔣的發端而言，大多數都認為一九三五年的〈八一宣言〉、瓦窯堡會議、或是中共抵達陝北開始。而由反蔣轉為逼蔣，則多以一九三六年四月周恩來與張學良的延安會商、五月中國共產黨的五五通電⁷⁸、八月共產國際的指示、或九月共黨的逼蔣指示信為轉捩點⁷⁹。由逼蔣轉為聯蔣，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或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的五屆三中全會，被視為是關鍵。至於七七事變以後到九月二十三日的蔣談話⁸⁰，則大家公認是聯蔣抗日，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或第二次國共合作目標的達成。

這樣的分期儘管不完全一致，但從事情的發展必定有過程來看，答案其實都不致於相距太遠。這當然方便我們掌握史實演變的脈絡，不過也存在有以偏蓋全的缺失：如抗日反蔣的時間幾乎長達一年，但在反蔣口號的同時，聯蔣的企圖和行動都已經開始了⁸¹。這種重疊和矛盾的現象，其實正是如蔣永敬教授文中所說「即反中有逼，逼中有聯，聯中有擁的情況。反過來看，擁中、聯中何嘗又沒有逼與反的情況。因此，要想嚴格的釐清它們的界限，實在是不容易的。」⁸²

（四）「蔣」的涵義因共黨策略不同而有變化

另外可以說明的是，其實隨著中共策略的不同發展，「蔣」的涵意是有變化的；而且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想法也不完全一致。比如〈八一宣言〉的反蔣，似乎是將「蔣」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區隔開來。但〈秘密指示信〉叫囂的反蔣，則是三者兼及。而瓦窯堡會議中的反蔣，則成了「漢奸賣國賊」一個籠統含混的名詞，為的是方便利用敵人營壘中的矛盾，來達到分化孤立的目的。至於後來的逼蔣和聯蔣，則應該是個人、黨和政府，三位一體。

伍、結論

中國共產黨自喻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的根本使命是最終要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⁸³。但是在日本侵略中國日亟的時局下，在國民政府始終不放棄剿共安內的國策下，在第三國際的授意指示下，以及在中共本身生死存亡的考

⁷⁸即〈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1936.5.5)，見前書，頁97-98。

⁷⁹即〈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1936.9.1)，見前書，頁123-124。

⁸⁰即〈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1937.9.23)，見前書，頁330-331。

⁸¹雖然瓦窯堡會議中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基本方針是抗日反蔣，但不論是共產國際、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還是中共中央，都在作聯蔣的呼籲和嘗試。參見楊奎松，〈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形成與共產國際〉，頁69-95。與黃修榮，《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史》(下)，頁214-222。

⁸²見蔣永敬，〈論中共抗日統戰初期的「抗日反蔣」方針〉，頁875-876。

⁸³菱農、宋林太：《第二次國共合作歷史經驗的探討》，全國中共黨史研究室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第二次國共合作》(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頁62。

量下，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將不符實際的策略逐步改弦更張，以適應新的情勢：也就是將民族革命擺在第一，階級革命置於第二；將日本升為頭號敵人，把國民黨降為明天的敵人。如此聯合次要的敵人，擴大合作的對象，以集中打擊主要的敵人，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套用共黨內部的說法：「只有首先爭得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然後才有使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獲得解放的可能。」⁸⁴因此，整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形成，可以說是一個經歷嘗試摸索，和在「錯誤」中糾正學習的過程。

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起點，〈八一宣言〉要比九一八事變符合事實。雖然〈八一宣言〉之前也用民族的字眼，並且〈八一宣言〉後的若干統戰策略，在前期也已稍露端倪。但是兩個階段明顯的策略路線、宣傳口號、統戰的形式、對象、方法等等，的確是大相逕庭的。所以對中共從九一八到〈八一宣言〉階段的統戰策略，名之為「抗日統一戰線」可也，但應該與〈八一宣言〉之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作區隔。

至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制定，究竟是受共產國際的直接指示？還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決定？根據資料的研判，應該是兩個因素都有。因為在中共與共產國際斷絕音訊以前，共產國際因應國際局勢的急遽變化，所作出調整下層統一戰線的新轉變，中國共產黨是知道並且遵照辦理的。等到「長征」中音訊不通以後，中共依據自身的實際經驗，並運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國的政治形式和階級關係的變動，也摸索體驗出來一套策略辦法。兩者有相同的部份，但也有因各自立場與處境不同而產生的差異。因此在〈瓦窯堡會議的決議〉當中，我們可以同時看到雙方策略路線的內容。

那麼對「蔣」的策略，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究竟是否一致？答案應是否定的。而這也不難理解。因為自九一八事變以後，共產國際的幕後指揮中心蘇聯，就採取多面外交的手法，其一方面同日本簽訂日蘇互不干涉條約，承認偽滿州國，出賣中東路，以緩和對蘇聯的威脅。而私底下蘇聯卻授意第三國際指示各國支部，發動全面保衛蘇聯的反日戰爭。另一方面蘇聯為了鼓勵中國抗日，和國民政府進行合作交涉，企圖簽訂中蘇中立條約，以減少中國對其的疑忌。所以是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基於蘇聯外交的考量，從「反蔣」逕自轉為「聯蔣」。但對中國共產黨而言，因為「蔣」始終沒有放棄安內之舉，所以「逼蔣」停止內戰，就成為不得不如此的課題。而就算逼蔣是為了聯蔣，逼是手段，聯是目的，但逼蔣的過程確實存在。

總之，經過一個曲折的過程，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終於隨著七七盧溝橋的號角響起而完成目的，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但算不算也是國民黨的勝利？抑或是中華民族的勝利？著實令人深思！

⁸⁴ 同前註。

參考文獻

一、史料

-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 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上)(中)，北京：檔案出版社，1984年。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一八九八~一九四九)》，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 中共中央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選集》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緒編(一)》，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
- 中華民國開國文獻編纂委員會及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 附錄 共匪禍國史料彙編》第二冊，台北：中華民國開國文獻編纂委員會，民國53年。
- 中華全國總工會編，《中共中央關於工人運動選編》(中)，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年。

二、專書

- 方曉主編，《中共黨史辨疑錄》，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 王邦佐主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 向青、石志夫、劉德喜主編，《蘇聯與中國革命(1917-1949)》，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年。
- 林華田，《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透視》，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4年。
- 郝晏華：《從秘密談判到共赴國難——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形成探微》，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
- 張梅玲，《干戈化玉帛——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
- 郭恆鈺，《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78年。
- 郭恆鈺，《俄共中國革命密檔(一九二〇~一九二五)》，台北：東大圖書發行，三民總經銷，民國85年。
-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三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東亞研

究所印行，民國 67 年。

黃修榮，《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史》（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年。

楊清海，《中共統一戰線剖析——組織、演變、論證》，台北：龍文出版公司，1991 年。

三、論文

王綺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與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江西大學學報》1985 年第 3 期。

李坤，〈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的歷史過程〉，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第二次國共合作》，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年。

李維志，〈共產國際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週年〉，《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5 年 3 期。

孟慶海，〈第二次國共合作與黨的策略轉變〉，《松遼學刊》1984 年第 1 期。

金再及，〈關於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夏以溶，〈共產國際與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的關係初探〉，《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5 年第 3 期。

夏以溶，〈再評反蔣抗日方針兼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分段〉，《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4 年第 2 期。

陳存恭，〈毛澤東抗日統戰策略初探〉，《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三屆討論會）台北：國史館出版，民國 85。

菱農、宋林太，〈第二次國共合作歷史經驗的探討〉，全國中共黨史研究室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第二次國共合作》，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年。

楊奎松，〈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形成與共產國際〉，《近代史研究》1982 年第 4 期。

蔣永敬，〈論中共抗日統戰初期的「抗日反蔣」方針〉，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台北：近代史學會出版，聯經總經銷，民國 85 年。

An Analysis and Differentiation about Several Controversial Question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National Japan-Resisting United Battlefront"

*Yu Wang**

Abstract

"National Japan-Resisting United Battlefront" wa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xercise of tactics i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CP) history of united battlefront, and also the one that changed CCP's history forever. It had crucial influences on CCP's growth in strength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gime latter. The text simplifies matters and makes an analytic differential demonstration concerning several controversial questions of research scholars : When was National Japan-Resisting United Battlefront put forth? Was it solely put forth by CCP or the authorized decision of its leading organization "Comintern"? What was the attitude of National Japan-Resisting United Battlefront to "Chiang Kai-shek (Chiang)"? Whether the considerations of CCP and Comintern were identical or not from original "opposing Chiang" to "alliance with Chiang" and "supporting Chiang" afterwards? What factor made the former policy convert? What were the content and the nature of National Japan-Resisting United Battlefront? Distinguishing the above-mentioned questions will be beneficial for us to understand CCP's position, character, and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resisting against Japan.

Keywords: National Japan-Resisting United Battlefront, Comintern, Aug. 1st Declaration

**Part-Time Lecturer*, Section for History and Humanities Teaching, Feng Chia University.